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經濟學帝國主義抑或行動理論的重建：對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反思

Economics Imperialism or Reconstructing Action Theory: Reflections on the 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doi:10.6523/168451532014060049003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49), 2014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49), 2014

作者/Author : 吳鴻昌(Hong-Chang Wu)

頁數/Page : 109-15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14/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523/168451532014060049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一般論文】

## 經濟學帝國主義抑或行動理論的重建： 對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反思 \*

吳鴻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conomics Imperialism or Reconstructing Action  
Theory: Reflections on the 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by

Hong-Chang W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zym1998@gmail.com

\*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所給予的指正與建議。此外，本文曾發表於 2013 年社會學年會，感謝評論者李威霆老師所給予的建議與鼓勵。我也必須感謝中研院社會所湯志傑老師於博士後期間所給予的鼓勵與建議。

收稿日期：2014 年 5 月 13 日；通過日期：2014 年 7 月 5 日

## 摘要

本文試圖從社會學理論的角度，檢討理性選擇的理論方案。本文的核心論點是，理性選擇理論內部具有高度的異質性，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已對新古典經濟學核心假設做出了許多的修正，因而並非「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入侵。為了公正性地評價理性選擇理論，本文試圖脈絡性地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內部與外部批判、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外部與內部批判，來檢討理性選擇的理論方案。通過這樣的考察，本文發現，理性選擇理論，無論是在經驗命題的驗證上、理性的概念上、情緒與價值規範的問題上、微觀與鉅觀連結與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上，都具有嚴重的理論缺陷，因而，理性選擇理論的社會學化與一統社會科學的企圖，終究是一場未竟的志業。

關鍵詞：理性選擇理論、經濟學帝國主義、社會學理論、微觀與鉅觀的連結

## 一、前言

自從 Gary S. Becker 等經濟學家開始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探究傳統被視為其他社會科學的議題（例如宗教、犯罪、婚姻、家庭）以來，理性選擇理論就成為社會科學場景中不可忽視的一場知識運動。隨著相關學者的努力，理性選擇理論，不僅有了自己主要刊物（特別是 1989 年創刊的 *Rationality and Society*），更試圖提供一種整合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理論架構的理論框架，以重整並統一社會科學。雖然，理性選擇理論，在傳統非經濟學的議題上、制度分析上、歷史分析上屢有重大的知識斬獲，<sup>1</sup> 但是，理性選擇的理論基礎，無論是理性自利人的假設、成本效益的分析、賽局理論的應用，幾乎都是來自新古典個體經濟學的理論援引，這也為理論選擇理論招來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批評，也引發了非經濟學學者對於經濟學殖民的抵抗（Archer and Tritter eds., 2000）。<sup>2</sup> 這些對於理性選擇理論

<sup>1</sup> 關於理性選擇制度理論，請參考後續新制度經濟學的討論。關於理性選擇理論在歷史社會學所引發的爭議，請參考 Craig Calhoun (1998)、Edgar Kiser (1996)、Kiser and Michael Hechter (1991; 1998)、Margaret R. Somers (1998)。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看似最非理性選擇的宗教社會學領域，理性選擇理論甚至是蔚為主流的取徑。關於宗教社會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爭議，請參考 Steve Bruce (1999)、Frank J. Lechner (2007)、David Lehmann (2010)、Lawrence A. Young (1997)。由於本文處理的是一般理論上理性選擇理論所引發的爭議，限於篇幅與旨趣，無法論及這些次領域所引發的爭議。

<sup>2</sup> 本文所要處理的主要是在社會學脈絡中，理性選擇理論所引發的爭議。事實上，在美國政治科學中，理性選擇理論已成為主流。有趣的是，在 2001 年，美國政治學內部出現對於主流理性選擇理論的反動運動 (perestroika movement in political science)。關於美國政治學內的理性選擇理論與這場政治學改造運動，請參考陳敦源、吳秀光 (2005)、徐振國 (2013)。至於，國內政治學界理性選擇理論發展狀況，請參考林繼文 (2005)。

的質疑，乃至於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固然可能出自於學科間知識版圖競逐的意氣之爭，但也不乏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缺陷的真知灼見。<sup>3</sup> 然而，我必須指出，許多理性選擇的評論者似乎都沒有意識到，理性選擇理論內部具有一定程度的異質性（至少可以區分為比較靠經濟學與比較靠社會學的兩端），因而無法簡單地將理性選擇理論等同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應用，同時，理性選擇理論的提倡者（特別是出身於社會學的學者）為了回應上述的批判，也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預設與概念工具做出了許多的修正（亦即將理性選擇理論社會學化），因而許多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無法簡單地適用於社會學化後的理性選擇理論。因此，為了更適切地檢討這場重要的知識運動，本文將不僅僅只限於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預設與概念工具提出批判，更將從理性選擇理論的社會學化著眼，試圖更公允且脈絡化地提出對於理性選擇理論的評價。

準此，底下的討論，我們主要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針對新古典經濟學。我們主要的討論對象，將是經濟帝國主義的兩位代表人物 Mancur Olson 與 Becker。除了批判性地回顧他們兩人的理論之外，我們也將援引經濟內的異端——以 Douglas C. North 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看其如何修正新古典的理論預設，以及又面臨怎麼樣的困境。同時，我也將回顧社會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延續著上述的討論，在第二部分，我們將進入對於社會學式理性選擇理論如何回應社會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進而將理性選擇予以社會學化。在這一部分，我們主要的討論對象會集中在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

<sup>3</sup> 在社會學內部，理性選擇理論雖不容小覷，但難以稱得上是主流。在台灣社會學內部，就個人所知，甚至沒有任何學者自我標榜是理性選擇論者，也極缺少一般性的理論選擇論述。

三位代表人物：John Elster、Raymond Boudon、James S. Coleman 的理論。在第三部分，我們將從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外部出發，回顧來自於不同理論立場的社會學家，如何批判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在第四部分裡，我們也將會回顧理性選擇理論陣營內部如何回應這些批判，並如何對理性選擇模式進行修正，以及討論這樣的修正是否可行。最後，在第五部分，我們將總結前面的討論，並提出一個簡單的結論。

## 二、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批判

### （一）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興起：霍布斯（Hobbes）的利維坦（Leviathan）幽靈

基本上，理性選擇理論的濫觴，在西方思想史可以追溯得很遠，至少，在古典政治經濟學與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中，就可以找到該理論的影子（Smelser, 1992）。但是，晚近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或者，更確切地說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濫觴，乃是起源於 Olson 與 Becker 以經濟分析侵入政治學與社會學的領域之中。

基本上，Olson (1965) 乃是以個體經濟學中關於搭便車行為、囚犯的兩難、公共財生產等概念，重新提問了集體行動與合作行為如何可能的問題，進而將經濟學的自利假設與成本效益分析，引入傳統屬於政治學、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的政黨、團體與組織的分析中。首先，他指出，傳統上，社會科學界或常識中都認同組織存在的目的在於增進群體的公共利益，然而，組織或團體的成員有共同利益亦有個

別利益，兩者不一定一致。那麼，在成員對於團體利益有不同想法並持有個別利益之條件下，共同目標的完成與共同利益的滿足等公共財生產問題，又是如何可能的？為了拓深這個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問題，他進一步利用自利個人假設與成本效益分析，指出了基於搭便車的狀況存在，公共財的生產，不但很難達到最適化的狀態，而且隨著團體規模的擴大，公共財的生產越形困難，而且，集體合作往往面對著個體搭便車行為所造成對共同行動的威脅。接著，他進一步指出，存在著三種不同但可以累加的因素，使大團體無法追求他們的利益或形成集體行動。一、團體越大，因個人為團體利益努力後所分的效益比率越小，越不能充分鼓勵團體取向的行為，因而團體的公共財生產越沒效率。二、團體越大，成員利益比率越小，要成員從公共財得到利益足以支付最少量公共財成本的可能性越低。三、團體成員越多，組織成本越大，生產公共財的門檻越高。基於這三項命題，Olson 指出，團體越大，所能提供的公共財離最適量越遠。因此，他認為只有提供個別的誘因才能激勵理性個人為團體效命。這種誘因，基於非一視同仁地個別化判準，便可以獎賞或懲罰組織成員的行動，如此集體行動才得以可能。換言之，從行動者是自利且理性的起點出發，集體行動必須基於外在獎懲機制，否則幾乎是不可能的。所謂的為公共利益而獻身（包括利他行為、社會運動、革命等），其背後都必然有獎懲機制與自利動機（其報償可以是物質的或精神的）。

上述，Olson 以個體經濟學理論，對於傳統上認為是以非理性（如情感連帶、憤滿、不公義感、相對剝奪感）行動為基礎的集體行動，所做的理性重構，可以說是經濟分析侵入非經濟領域的牛刀小試。<sup>4</sup> 真正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旗手，乃是 Becker (1976) 一連串針

<sup>4</sup> 在經濟學裡，往往認為公共財因為不具排他性且具有外部性，無法由市場

對傳統屬於社會學領域的犯罪、婚姻、家庭、教育等現象，所做的經濟分析。Becker 的理論常常提出一些違反直覺，但是卻又看似合理，而且具有政策指導的規範命題。他甚至更激進地主張，經濟學並非只是處理市場如何運作的科學，經濟學乃是一種處理選擇的科學，只要人們需要做選擇，那麼這必然屬於經濟學的領域，經濟學的理論工具擁有比其他理論工具更強大的解釋力與預測力，更能洞穿事情表面上的理所當然，提供反駁常識的科學解釋。正是基於這樣的宣稱，他的理論被視為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對其他領域與學科殖民的代表。

然而，我必須指出，Becker 的理論，在表面看似強大的說服力背後，卻有著理論邏輯上的內在弔詭，他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不過另一種功利主義的道德工程學翻版。我們可以簡單地用 Becker (1993) 所謂「用罰金來取代自由刑，長期而言將減少犯罪率」命題，點出其理論的內在弔詭。他想法其實相當簡單，只要把當前的許多刑罰（自由刑）改成罰金，透過明確而清楚的價格機制（具有訊息傳遞的功能），使犯罪與犯罪的後果，能夠基於行動者對於金錢誘因的高度敏感性，被納入犯罪的成本效益的考量中（讓其覺得不划算或者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長期而言，犯罪率應該會降低到某個均衡點。至於那些付不出罰金的，則強迫其勞動，使其償付其該付的罰金。事實

---

來生產，故必須由政府來提供。Olson 的理論基本上是從這樣的理路出發，將合作問題與集體行動定位成一種公共財的生產。因此，他理論的力道並不在於強調公共財如何被生產，而是，指出傳統被視為以情緒、認同感為基礎的集體行動，其實是以個體理性基礎的，進而促成了社會運動中資源動員理論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的產生，使得對於社會運動、群眾運動的討論，不再受限於傳統的社會心理學的解釋。然而，即使我們不批評 Olson 的理性自利個人的假設，我們仍然可以指出，他所謂利用獎懲機制來促進合作與集體行動，不單忽視監控成本的存在，因而也低估了社會團體的儀式機制，對於降低監控所具有的效益 (Hechter, 1984)。

上，這種對於犯罪的思考很接近於邊沁對於圓形監獄的想法（他亦援引邊沁的說法）。<sup>5</sup>然而，歷史上，邊沁的圓形監獄改革之所以失敗，正是在於圓形監獄作為勞動場，其運作結果，不但沒有解決犯罪的問題，反而「如何維持圓形監獄本身的運作」問題，逐步地取代原來其如何有效地改善刑罰的問題。此外，圓形監獄也無法因應新的犯罪類型、累犯、少年犯罪等問題（Foucault, 1977）。因此，從邊沁圓形監獄改革失敗的例子來看，針對 Becker 的「用罰金來取代自由刑，長期而言將減少犯罪率」的命題，我們可以指出，他的想法高估了罰金對於新興型態的白領犯罪、金融犯罪、集團詐騙等，以龐大金錢為犯罪對象的遏止作用，而且，為了有效執行懲罰（追繳罰金），必然會需要執法的科層組織，為了避免犯罪人收買執法人員，以及避免執法人員的貪贓枉法（這是基於相同自利個人假設的合理推論），則必須疊床架屋地設立監控的機構（甚至還必須設立監控「監控機制」的機構，乃至於無限遞迴地關於「監控的監控」）。於是，問題將會逐漸從犯罪的下降與否，轉移到科層組織如何管理，以及監控成本逐步升高的問題上（Hechter, 1984）。換言之，即便我們不批評 Becker 在人性預設上的謬誤，<sup>6</sup>從理性的自利個人出發，基於執法成本、監控成本

<sup>5</sup> 簡單地說，邊沁認為，圓形監獄作為一個勞動場，凡是犯罪的人，我們就強迫他勞動，透過他的產出來創造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潤，而且，圓形監獄的設計，使行為者在圓形監獄的運作下，產生內化的外在監控，進而矯正行為人的犯罪動機。至 Becker 與邊沁的差別在於，Becker 認為，只有那些繳不出罰金的人，我們才把他丟到監獄之中，強迫其勞動，以彌補其造成的損失。

<sup>6</sup> 經濟學家往往會援引一種“as if”工具主義知識論立場（源起於 Frank Knight，後經 Milton Friedman 發揚光大），來捍衛他們的理性自利個人的假設。他們並不主張理性自利人的假設，正確地反映了社會的真實，但是，基於建構理論模型的需要，必然需要一些無須被經驗檢證的公設。理論的有效與否與漂亮與否，在於其預測能力與所需要的公設多寡，而不在於假設的真

等交易成本的存在，Becker 對於刑罰改革的建議，或許可以遏止犯罪率的升高，但是卻可能反而導致霍布斯的利維坦幽靈——極權警察國家的出現（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能的）。<sup>7</sup>

總而言之，從理性自利的個人出發，無論是 Olson 對於必須依賴獎懲機制來解決合作的不可能的強調，以及 Becker 一連串針對不同社會現象的經濟學理性選擇分析，幾乎都正面（Olson）或負面（Becker）地點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功利主義，無法從自利個人的假設，內生地提供社會秩序的保證（主要的原因都是交易成本的存在所引發的執行與監控問題），而且，往往必須迎回霍布斯的利維坦幽靈，以解決理性自利個人的假設無法處理的社會秩序問題。

## （二）新古典經濟學的內部反叛：來自新制度經濟學的修正

上述 Olson 與 Becker 的論點，都忽視交易成本的存在，因而也

---

實與否。他們更指出，即使這樣的公設相當不符合人性或真實，但是，基於這樣假定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模型，仍是研究經濟與其他社會現象的最好方法（Boudon, 1998；North，劉瑞華譯，1994，頁 25）。撇開複雜地科學哲學與方法論上的討論（cf. Hollis and Nell, 1975），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as if”假設的荒謬性。我們可以假定蟑螂的嗅覺器官在足部，並做出「失去嗅覺器官的蟑螂，將不會躲避有刺激性的消毒水」的命題，因此，只要拔掉蟑螂足部，這樣的預測無論在怎樣的實驗條件下，基本上都是會成立的。然而，這樣百分之百準確無誤的例子，足以指出上述“as if”假設在科學解釋上的荒謬。

<sup>7</sup> 而且，基於理性選擇理論的行為假設，我們更可以預料，極權國家為了進一步維持這龐大利維坦的運作，必然會逐漸地將刑法訂的多如牛毛，以獲取最大的罰金作為資金的由來。並且，基於 Olson 的命題，人們無法主動發起集體行動推翻這個極權國家。

低估了制度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進而忽視了制度對於行動者選擇的限制。這樣的缺陷，正是新制度經濟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內部反叛理由與基礎。在新制度經濟學中，North 的理論毋寧地提供了最為完整的理論框架。雖然，他的理論仍是以經濟現象與經濟史為對象，但是，他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毋寧地更往社會學方向靠攏，也預示了許多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發展方向。因此，我們將進一步討論他如何對於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做出修正，又具有怎樣的問題。

首先，North（劉瑞華譯，1994）開宗明義地批評個體經濟學賽局理論分析，進而點出制度分析的必要性。<sup>8</sup>因此，他進一步修改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假設，提出新制度經濟學自身的行為假設（主要是強調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以及拒絕將偏好視為既定的），<sup>9</sup>並引入交易成本的觀念，發展出對於非正式規則、正式規則、執行與監控的結構特性的討論，<sup>10</sup>進而回過頭來討論制度、交換成本與轉換成本之間的關係，然後導出四項命題：一、正式與非正式規則所形成的制度的關係網絡，決定了不同情況下，行動者的選擇範圍。

<sup>8</sup> North 批評個體經濟學的賽局模型，有許多嚴格的假定是經不起實證的考驗。他指出，個人是根據不完全的訊息而行動，而且，重複賽局的訊息回饋亦不足以改變行動者的主觀認知模型。此外，許多真實世界中賽局規則的制訂，也未必或是很少用來達成社會的效率，反而只是滿足訂規則者的利益，因而賽局理論對於合作問題的解答是無效的。這樣的論點，明顯地挑戰了Olson 從囚犯兩難出發的集體行動理論。

<sup>9</sup> 然而，在處理行為假設時，North 事實上也清楚地意識到一個他整本書都無法處理的問題：偏好如何產生變動，意識型態該如何處理？我們該如何「詮釋」行動者如何「詮釋」他對於他的環境的觀察？

<sup>10</sup> 事實上，我們必須指出，North（劉瑞華譯，1994，頁47-57）對於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的區分並不是很清楚。而且，他一方面承認非正式規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解釋不清楚該怎麼分析這些屬於心態層次的非正式規則。於是，理性行動這假設又奇怪地被搬回來了。

這也容許連續性累加的變動，使得新的選項得以出現，制度因而發生變遷，這就是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討論重點。二、制度所造成的非正式與正式限制的組合，會反映衡量和執行的成本，從而形塑交換的型態。三、在制度架構中，最可以衡量的是交易成本。四、在經濟成就方面，制度架構扮演重要角色。在建立起這個四個命題後，North 引入組織（廠商）來作為制度變遷的觸媒（假定了廠商追求利益極大化）。他指出，當相對價格發生變動時（無論是制度內生或外生的變化），會提供組織的行動誘因，進而做出如投資、創新等行動，這些行動的逐步累積，就會導致制度變遷，並且，考量報酬遞增與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網絡外部性、組織學習歷程、歷史衍生的主觀模型等制度鎖進因素，就可以決定制度變遷的方向與路徑依賴的過程。

在上述洋洋灑灑的架構中，North 自己仍承認文化、價值、理念、意識型態仍是他的架構中無法解決的問題。<sup>11</sup> 此外，雖然他宣稱要擺脫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但是，事實上他仍擺脫不了成本效益的經濟分析。他往往有意無意地將均衡、效率等概念重新迎回分析架構中。因此，對於不同制度間的協調、衝突與整合等問題，價格、均衡等成本效益的分析往往仍是他最重要的考量。而且，當他用均衡選擇、鎖進、路徑依賴來解釋制度變遷時，他不但不能解釋制度變遷的誘因——相對價格何以會發生變動（這些因素無論是外生或內生都不存在 North 理論解釋模型內），也無法解釋相對價格的變動如何涵

<sup>11</sup> 在後來的發展中，North (2005) 試圖透過認知科學的引進，藉由人類大腦如何篩選資訊，以及個人與集體的學習過程等來處理信念、文化與意識型態等問題。只是，這種對於主觀面的生理與心理分析，是否真能處理主觀詮釋上的「意義」難題，仍是令人感到疑慮的。

攝進制度內被行動者所感知。<sup>12</sup>最後，雖然他很小心地處理制度演化的問題，但是，他的均衡分析（即便是修正過的制度性局部均衡分析），仍避免不了將社會的變化過程，理解成處於兩個均衡狀態間的過渡。於是，制度的變遷會以一種階段性的方式來加以處理，而非被視為是一種動態過程。<sup>13</sup>

簡言之，North的新制度經濟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大致上指出了理性選擇理論的修正方向：一、承認新古典經濟學嚴格的理性自利個人假設的缺陷，改採有限理性的觀念，容許行動者偏好的改變，強調追求情境依賴下的理性最大化利益等較弱理性行動者的假定。二、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對於社會結構的忽視，並且，進一步主張監控制度可以解決搭便車的問題，以及制度對於行動者選擇的形塑與限制。三、引進組織（法人團體或廠商）的概念，並透過相對價格、制度誘因、集聚（aggregation）機制、路徑依賴與鎖進效果，提供了某種連結微觀與鉅觀的理論架構。然而，North的理論的問題，正在於他一方面承認非正式規則的優先性、偏好是可能改變的，也宣稱成本效益分析、均衡概念必須揚棄或鬆動，但是，另一方面他的理論卻無法解釋文化、意識型態、價值等因素，

<sup>12</sup> 基本上，North的論點是認為相對價格的變動會產生結構性誘因，導致行動者做出改變制度的行動。然而，問題便在於他採取了一種理性選擇的行動者模式，這卻導致行動者的偏好是如何改變或者行動者是如何認知此一誘因，變成無法解釋的。此外，這一涵攝過程中，行動者的行動又如何對於制度產生的作用，亦不清楚。

<sup>13</sup> 正如 Norbert Elias (2000: 453-482) 在批評 Talcott Parsons 的演化論時所指出的，一旦將結構、制度視為一種靜態的體系，那麼理論架構將完全無法處理時間、變遷的問題。Elias 認為，必須採用一種將變化視為社會的正常現象，以不斷地變化的社會結構為前提來定義制度（同時包含穩定與變異），如此我們才可能使結構與制度的定義包含時間的向度，才能妥適處理變遷的問題。

對於偏好形成塑與制度變遷所具有的影響，導致他的理論模型只能以一種掐頭去尾的方式，自我矛盾地迎回均衡、效益分析的分析方式來解釋制度的變遷。

###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外部批判：社會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質疑

相較於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內部修正，社會學，特別是經濟社會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式的理性選擇觀點，亦有相當多的批評。底下，為了使討論能夠聚焦，我主要以分析單位、理性概念、理論的普遍性上等層面，來討論社會學所提出的質疑與批評。

基本上，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通常都是以原子化的個人作為其分析的起點，然而，這樣的分析單位，以及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主張，對於社會學而言，是相當有問題的。Mark Granovetter (1985) 就曾指出，主流經濟學關於原子化個人的假設，往往假設了社會制度、人際關係對於經濟行為影響是不重要的，陷入 Dennis Wrong (1961) 所謂低度社會化個人的錯誤。Granovetter 進一步指出，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意味著經濟學內部，似乎也意識到原子化自利個人的命題，乃是不當與偏頗的。然而，新制度經濟學所做的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修正，以及所提出的「市場與階序」(market and hierarchy) 命題 (Williamson, 1975)，不過是霍布斯秩序問題之自然狀態與利維坦的翻版，依然擺盪在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個人的兩難。基於此點，他提出所謂社會鑲嵌的命題，主張社會行為必然涉及至少一對行動者的互動過程，因此必須採取一種關係論的立場，將行動者與其行為視為乃鑲嵌於綿密的人際網絡中，如此一來不但可以保有行動者能動性

(agency)，更可以兼顧社會結構對於行動所提供的限制、機會、資源。換言之，社會學認為社會行動的分析單位應該是互動而非個人行動（至少必須是指向他人的社會行動），因此，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原子化自利個人假設是不足取的。

除了在分析單位的批判之外，社會學往往對於經濟學狹隘的工具理性概念有所批判。Zenonas Norkus (2000) 就從韋伯 (Max Weber) 的行動類型出發，強調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太過片面地強調工具理性的行動類型，不但忽視了價值理性的存在，也忽視了其他行動導引的可能。Philip A. Woods (2001) 亦指出，社會行動理論的有效與否，則必須立基於其對於人性預設的適當與否上。他建議以韋伯的四種行動類型來修正狹隘的工具理性。同樣基於韋伯論者的立場，Milan Zafirovski (1999; 2003) 更從社會學理論、經濟學思想史與經濟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對於理性選擇理論關於目的行動、理性、市場均衡、方法論個體主義、偏好的穩定性等概念，予以檢討。他指出，理性選擇理論的理性概念，過於傾向於功利主義的功效概念，這樣的理性概念乃是嚴苛、狹隘、過於客觀的、缺乏審議 (deliberate) 可能的理性概念，因此，他呼求一種更寬廣的理性概念重建，以建構更具變異性的行動類型，以及更能連結鉅觀與微觀的理性行動理論。此外，Zafirovski (2000a; 2000b) 更批評理性選擇理論作為統一的社會理論宣稱，是必然失敗的。他指出，當新古典經濟學在經濟學內部甚至都只能算是一種特殊理論的情形，類似於 Becker 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的主張，是毫無任何說服力的。換言之，透過社會學對於經濟學過於狹隘的理性觀念的批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討論理性選擇理論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問題。

針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興起，以及理性選擇理論是否具有普遍性

的解釋效力，Neil J. Smelser（1992）曾做出具深刻且具有同情性的批判。首先，他指出，無論新古典經濟學、還 Coleman 等人的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基本上都共享著個人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立場。然而這樣的立場，與其說是理論上的進步，倒不如說是一種理論上的復古。個人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立場，乃是西方啟蒙運動的烏托邦進步觀下的產物，特別表現在功利主義的理路上。這種功利主義的實證主義，乃是古典牛頓力學機械論世界觀下的產物，而且，基於啟蒙運動的烏托邦進步色彩，使得功利主義奇怪地同時具有規範與實證的色彩。其次，他也指出，所謂的自利理性行動者的假設，在理性選擇理論中，乃是扮演居間協調的角色，可以用來連結外部決定性結構變數與可觀察的個體行為。但是，這樣的理性行動者的假定，事實上只是將許多必須考量的中介的變數，如心理過程、情境、制度脈絡，簡單地視為固定予以懸而不論。只是，從這樣的理論建構來看，這樣的假定只能用來解釋市場行為，而且具有非實在論的色彩。再者，他也指出，通常對於理性選擇理論有以下幾點批評：一、過於強調物質利益與享樂主義的行為假定；二、在許多領域，行動者大多數行為乃是非理性的；三、所謂的理性計算在個人認知、心理學上、社會學上都站不住腳；四、錯誤地假定行動者保有完整決策資訊的完全理性（清楚所有可能行動選項、目的與行動後果）；五、如同 Parsons 所指出的，理性地追求自利的行為，乃是以制度為基礎的而非基於動機的；六、來自經濟人類學、（舊）制度經濟學所提出的互惠原則與制度鑲嵌等批判。對於這些批判，理性選擇論者通常有以下幾點回應方式：一、經濟行為不限於物質利益上的報酬；二、將理性行為視為啟發性的假定，而非是經驗性的主張與宣稱；三、限縮經濟學的範圍，不宣稱所有交易都必然是理性選擇的；四、將所謂不理性行為翻譯是理性行

為，指出其背後都具有自利基礎；五、將對非自利行為與脈絡因素的忽視，僅僅視為方法論上的權宜取捨，而非一般性理論缺陷。最後，Smelser 更指出，即便我們承認理性選擇論者的回應是有效的，而且理性選擇模式事實上已有效地延展至其他社會科學的領域，但是，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仍具有兩個基本的理論困境：一、所謂的理性對誰而言是成立的？是觀察者的所持有的客觀的與科學的理性，還是行為當事人的主觀理性？二、經濟學的對象乃是特定制度脈絡下的產物，那麼經濟學如何能夠延展其他制度領域，而不失去其解釋力呢？當經濟學宣稱可以解釋所有事情，那麼這是否意味著這根本沒有解釋任何事情，這是否代表一種理論的退化呢？

總而言之，從上面的討論來看，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指出理性選擇所面臨理論上的缺陷：一、原子化的個人的假設：原子化個人主義的假設，不但犯了低度社會個人的毛病，更忽略了社會結構、人際連帶對個人所可能造成影響。而且，這樣的假定，看似為理性選擇理論製造了許多有待解開問題，使其展現其違反直覺的理論解釋力，但卻也使其無解於霍布斯秩序問題。二、工具理性的行動類型：理性選擇理論往往採取過於嚴苛的、工具理性的、客觀的理性判準，因而，不但沒有對於行動者的偏好與主觀意義給予討論，而且，他們看似宣稱了理性選擇，卻弔詭地沒有為「選擇」留下任何餘地，甚至也沒有為「理性地審議」留下任何空間（Hodgson, 1999: ch. 2; Sen, 1977）。在客觀理性與完全理性的假設下，行動者事實上只能對於給定的選擇序列（效用函數與約束條件）下，機械地做出回應（最大化行為）。三、特殊理論還是普遍理論：以工具理性出發的理性選擇理論，無論從思想史還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乃是西方現代性下市場經濟的產物（Polanyi, 1944; 1947）。因此，理性選擇理論所分析的工具理性行

動，乃是以市場制度作為前提的，而非人類普遍具有的心理動機。換言之，我們甚至可以說，理性選擇理論不但只是一種特殊的行動理論，其過度宣稱的普遍性與解釋力，與其說是理論上的優勢，反而可能是因為理性選擇理論所具有的規範性與社會工程性色彩，透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促成非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反過來證成了其理論的有效性（Archer and Tritter eds., 2000）。

### 三、理性選擇理論的社會學化

上述對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三項批評，無論是特別是原子化個人假設的缺陷、工具理性的限制與經濟理性的歷史性，可以說是社會學的基本理論立場。當理性選擇理論延展到社會學領域時，這幾項批評或多或少都必須被面對（新制度經濟學一定程度上也回應了這三項批評）。因此，底下我們將討論社會學理性選擇的三位代表人物：Elster、Boudon 與 Coleman，如何針對這三項批評，對於理性選擇模式進行更成熟地精緻化。

針對這幾項批評，Elster (1982) 試圖從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立場來證成理性選擇理論。他指出，方法論論個體主義並不等同於政治或倫理上的個體主義，亦不等同於原子化個人假設。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立場乃是堅持社會現象必然只能從個體的性質、目標與信念來加以解釋。因而，所有結構式的概念與長期趨勢的解釋，若是無法奠基於個體基礎，那麼都將淪為空想（因此，他不接受馬克思主義中的功能主義與結構主義）。他進一步指出，所謂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以下幾個原則是相容的：一、個體通常具有指向他人的目標；二、他們擁

有超乎個人層次實在的相關信念；三、許多個體擁有的性質（如擁有權力），具有不可化約的關係，因此，必須有參照其他個體來加以解釋。基於這樣的修正後，他進一步澄清他所認可的理性選擇理論，具有兩個基本的理論公設：一、結構並不完全決定個體行動，二、在結構限制下所容許的各種行動，行動者會選擇他們相信會帶來最佳結果的行動（理性乃是行動者主觀理性）。<sup>14</sup>

類似於 Elster 在方法論個體主義、主觀理性與尋找個體基礎的主張，Boudon 的論點，顯然地更具有社會學的基礎。為了避免過度經濟學化所導致的缺陷，Boudon（1981）試圖從古典社會學出發，奠定其理論與方法論的社會學根源。<sup>15</sup> 他指出，古典社會學明確了社會學三項基本命題：方法論個體主義、行動類型乃是多樣且複雜的、社會乃是一個互動系統。此外，Boudon（1982）更進一步援引 Robert K. Merton 的功能分析（有別於 Parsons 的功能論）來指出，社會學分析必須奠立在情境依賴的有限理性，<sup>16</sup> 同時必須兼顧行動的預期與非預期結果，並透過環境、互動系統、結果的積累與遞迴效應等，三者間的互動關係來解釋社會變遷。進而，他提出了所謂社會人的五大命

<sup>14</sup> 鑒清完方法論上的立場，Elster 便將賽局理論所討論的若干問題（如資訊問題、合作問題、囚犯兩難、搭便車的問題、不同賽局的局部均衡解），為馬克思主義之資本家與勞工的對抗關係，以及關於社會結構與歷史變遷等理論，奠立了穩固的個體基礎。然而，有趣的是，他承認為馬克思主義尋個體基礎，仍是有待努力的嘗試，他更承認這樣的結合，仍停留在說明層次，尚無法提供可驗證的經驗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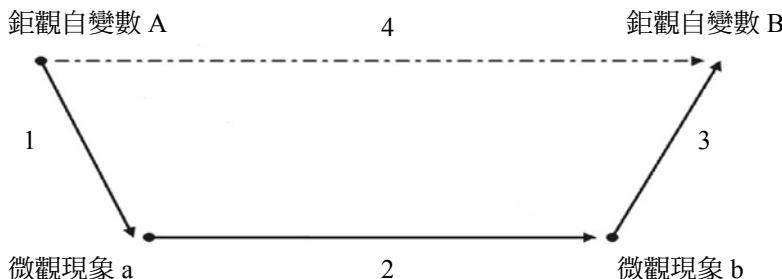
<sup>15</sup> 他主要是從 Vilfredo Pareto 的邏輯行動與非邏輯行動的區分出發，經由韋伯的行動類型，並透過方法論個體主義重建涂爾幹（Durkheim）的社會連帶理論。

<sup>16</sup> Boudon 指出，他所謂的情境依賴的有限理性，乃是基於長期考量與短期考量間落差的存在，因而必須兼顧行動的預期與非預期結果，而且承認角色扮演、價值內化、規範、認知、行動者的合理化等行動要素的存在。

題：一、社會人受到習慣、內化價值、倫理、認知等的限制；二、行動者對於最終結果是不明確的，因而有風險問題、亦有後悔的可能；三、經濟人不過是社會人的特殊類型；四、行動者自我合理化之主觀理性的重要性（即便在客觀上可能是錯誤與虛假的）；五、承認角色的規範色彩。

相較於 Elster 與 Boudon 的將經濟人轉化為社會人的努力，Coleman 的修正則略有不同。除了宣稱所謂的個體基礎的重要性之外，他更為理性選擇在微觀與鉅觀的連結找到理論上的立基，也藉由此理論基礎，為工具理性行動找到定位與捍衛的理由。首先，Coleman (1984; 1988) 指出，經濟學的分析往往對於社會網絡與社會結構的考量是有所欠缺的，因而無法提出適切的社會理論。其次，Coleman (1986) 更指出，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乃是解釋社會現象而非解釋個別行為，其分析單位最小乃是互動系統而非個人（因而他避開了原子化個人所帶來的難題）。因此，他呼求一種對於行動系統的分析方式。然而，他也指出，在社會學內部，一方面社會理論（主要是功能論）自中期 Parsons 之後，放棄了將社會理論奠立在理性行動基礎上的嘗試，另一方面，經驗性的社會研究則是停留在以個人為分析單位，無法提供社會系統整體性分析，這導致理論與經驗研究的斷裂，扼殺了社會學知識的進展。因此，他主張必須將個人與社會視為兩種獨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動體系，這兩個系統間微觀與鉅觀的交互連結，乃是社會理論擺脫經典詮釋，並使社會理論具有現實感以及指導研究方向的關鍵所在。接著，為了提供這樣連結的理論基礎，他認為，我們必須從方法論個體主義出發，透過個體行動與社會行動系統的直接與間接的連結，解釋社會系統的變化。最後，基於社會理論乃是解釋社會系統而非個人行為，以及理論上的簡約因素，他認為在社

會分析上必須保持鉅觀現象的具體詳盡與微觀現象的清晰簡潔。為了兼顧理論的預測能力，他也認為，在微觀個體行動層次，可以採取具有目的論色彩的、尋求最大效益的工具理性行動。然而，Coleman (1990) 並不因此而接受經濟學將社會系統視為個人行動集聚的假設。他指出，微觀與鉅觀連結，最為關鍵的路徑 3（請參考下圖 1），<sup>17</sup> 大致上有六種可能的模式：一、個別行動的非預期結果；二、只有雙邊交換的互動系統；三、市場競爭結構；四、集體決策或社會選擇；五、社會組織；六、集體權利的建立，利用賞罰分明的規範進行社會控制。<sup>18</sup>



資料來源：圖為本文所繪，參考 Coleman (1990: 8)。

圖 1 微觀與鉅觀的連結

<sup>17</sup> 在原始的討論裡，Coleman 主要是以韋伯的新教倫理（鉅觀自變數 A）與資本主義關係（鉅觀依變數 B）為例。他一方面說明韋伯解釋上的不當，他認為韋伯的解釋，的確說明了新教教義如何影響了行動者的價值觀（路徑 1），並說明這些價值觀如何影響了他們經濟行動上的定位（路徑 2），但是，卻關鍵地缺乏路徑 3 的解釋，沒有說明這些個體的經濟行動如何導致資本主義；另一方面，透過這個例子，Coleman 也強調了方法論個人主義與路徑 3 在社會學解釋上的重要性。

<sup>18</sup> Coleman 指出，對於當代社會而言，結合五與六所產生的法人行動團體（組織與規範、權利設定）乃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簡言之，基於經濟學理性選擇所遺留下來的三項缺陷，以及為了將理性選擇理論予以社會學化，Elster、Boudon 與 Coleman 大致做了以下三點修正：一、深化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立場，並強調行動的非預期結果、互動、社會結構限制的存在。二、放寬理性的定義，採取有限理性或者主觀理性的看法，並且承認規範、認知基模等因素的影響。三、透過指出既有社會學理論的缺陷（功能論者與結構論者），奠立了理性選擇的個體基礎的必要性，並且將理性選擇理論的利基，奠定在微觀與鉅觀的連結上。

#### 四、對於理性選擇理論的外部批判：對於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的質疑

上述的理性選擇理論社會學化，其理論的精緻度，似乎已經克服經濟學對於社會複雜性過於天真樸素的缺陷，使得理性選擇理論逐步地走向完整與成熟。然而，當理性選擇入侵到社會學界，仍遭來許多的非議。除了上述我們已經所指出的社會學對經濟學的批評外，不少社會學家都出自不同的理論立場，提出強而有力的批判。然而，為了使討論的焦點集中，我們大致上可以從經驗上的有效性、理性的概念、方法論個體主義、微觀與鉅觀的連結、社會秩序問題等議題來整理這些外部批判。<sup>19</sup>

首先，理性選擇理論通常標榜其在經驗上具有高度預測能力，

<sup>19</sup> 這裡必須提醒，這些外部批判通常是通稱地對於理性選擇理論進行批評，其批評對象常常涵蓋了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而非僅僅只是非針對 Elster、Boudon 與 Coleman 的理論。

故能比起其他理論來的更有優勢，作為其正當性的基礎。然而，Adriano Pappalardo（1991）從政治學的理性選擇化所導致的問題，提醒社會學的理性選擇化乃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他指出，從政治學的理性選擇化的經驗來看，除了極端的最好與最差的情況，理性選擇理論無法提供真正的預測，而且，理性選擇理論事實上很難解釋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項政治學事實：人們如果是自利的，人們為何要投票（在成本效益上完全不划算）？此外，他更指出，基於社會現象所具有的高度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理性選擇理論通常必須引入許多附屬性假設，然而這些附屬性假設不但沒有被妥善的解釋，而且也破壞其自我宣稱上理論的清晰簡潔。此外，理性選擇理論的許多經驗性命題，亦極端地不符合大多數的政治行為。

其次，社會學式理性選擇理論雖然往情境依賴的主觀理性與有限理性上修正，並且承認其他非理性的行動因素的存在，但是，正如 Maria Carmela Agodi（1991）所指出的，理性選擇理論雖然對於理性的概念有所放寬，但是事實上並沒有辦法在理論架構裡，容許對於行動者主觀意義的詮釋可能。同樣地，Norman K. Denzin（1990）更從詮釋社會學與後現代主義的立場出發，批評理性選擇理論往往採取過於自我中心的行動者假設，而且其對於理性的偏執，亦忽視情緒在社會行為所扮演的角色。他更指出，理性選擇理論對於行動者的刻畫，即便放寬了目的理性的討論，採取有限理性的說法，但仍忽視了詮釋社會學所強調理所當然的態度對於化約不確定性情境的重要性，以及主觀與客觀、相互主體性、公共與私人等重要議題，因而，理性選擇理論沒有辦法回答「社會是如何可能」的問題，也無法處理主觀意義的問題。因此，他呼求重視情緒的重要性，並用日常生活合理行為取代理性選擇理論狹隘的理性假設。

換言之，這樣一種對於主觀意義與情緒等因素的忽視，反應了理性選擇理論對於理性概念的偏誤，而且其所謂的主觀理性與有限理性的修正，在理論上仍具有高度的缺陷。Barry Hindess (1988) 就曾指出，類似 Becker 等人所謂「非理性皆有理性自利基礎」的宣稱，乃是過度且不當的。他也指出，雖然大多數理性選擇論者只是把理性當成一種啟發性的工具，而且不排斥非理性的元素，但是，理性選擇理論在對於行為者的假定與理性概念是有極大的缺失的。理性選擇理論通常立基於三個假定：行為者具有穩定性的偏好、行為者是自利的、以及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立場。然而，所謂穩定性偏好的假定，乃是將行動者視為一種具有偏好投資組合 (portfolio) 的行動者，這是犯了跟功利主義一樣的謬誤。事實上，社會生活裡充滿許多不經決策的行動，或者不引起任何效果的行動，這些行動對於理性選擇理論而言，幾乎是無法解釋的或選擇性忽視的。此外，他更指出，要理解主觀意義，必須要能夠詮釋行動者的偏好與信念，因此，以文化與參考團體來定位為詮釋尋求基礎是必要的，故而自利個人假設是有問題的。理性選擇的偏好投資組合的行動者假設，事實上並沒有為解釋行動者如何思考審議留下任何空間。

除了上述對於理性自利個人假設的批評外，針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立場，Hindess 亦做出批評。他指出，方法論個體主義只會導致一種化約論的立場，將社會結構都化約到個體行動，事實上，行動是必須依賴於外部性前提的存在。許多看似理性選擇理論做出妥善解釋的經驗事例，通常都隱含著某種結構決定的思考形式因素在內，理性選擇理論的行動者假設與個體主義的立場，並沒有辦法解釋為何行動者會有這些或那些目標，也沒有認識到社會行動者往往具有某些社團的成員屬性與持有某些社會分類的認知範疇。簡言之，Hindess 認

為理性選擇的形式分析並沒有告訴我們行動者如何具體地決策思量，也沒有辦法解釋行動者所採用的思考框架，以及其所依賴的社會條件。同樣地針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問題，Douglas V. Porpora（1987）也指出，Elster 等人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立場，正確地批判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的缺陷，然而，Elster 實際上也認識到，理性選擇理論無法完全排除整體主義的因素，因而陷入一種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兩難。Porpora 更指出，這種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兩難，乃是因為理性選擇理論對於社會結構概念的理解過於粗糙，因而對於結構與行動、微觀與鉅觀間的關連，也過於低度理論化。<sup>20</sup>

這樣克服行動與結構、微觀與鉅觀的努力，似乎已經表現在 Coleman 的定位與修正上。然而，Coleman 的修補仍具有極大的缺陷。William H. Sewell（1987）就曾指出，Coleman 太過輕易地把理論重心擺在路徑 3，而對於路徑 1 和 2 過於理所當然。在所謂的路徑 2 上（微觀 a 到微觀 b），並非單純只有微觀因素，如果要妥善地提供路徑 2 的社會學解釋，必然要引進其他鉅觀因素（特別是微觀 b 所座落的鉅觀條件）。至於路徑 1（鉅觀 A 到微觀 a），Coleman 則是忽視了社會文化與結構對於個人的形塑，錯誤地將個人利益、偏好、目標視為給定。至於，Coleman 最注重的路徑 3（微觀 b 到鉅觀 B），Sewell 則是批評 Coleman 過於輕易地賦予行動者創造規範的可能，使得行動者似乎能在真空中無中生有地創造鉅觀結構，這是一種反歷史與反文化的解釋，不但忽略路徑 3 所涉及其他鉅觀因素，而且也沒

<sup>20</sup> 基於 Ludwig Wittgenstein 私有語言的論證，Porpora 指出，方法論個體主義無法妥善地處理規則產生與規則依循（rule-following）等問題，因而是站不住腳的。他指出，必須採取關係論的立場，將社會結構視為一種個人範疇間的關係，即可避免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虛假對立。

有告訴我們社會結構如何因人類的行動發生改變。

同樣基於鉅觀與微觀連結的批評，Randall Collins（1993）認為他自身的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理論，比起理性選擇理論的微觀—鉅觀連結方案，更能全面性地理解社會行動與社會秩序的關連。他指出，理性選擇理論往往具有幾項理論上不可修補的缺陷：一、成本效益分析，往往無法妥善地處理情緒、利他、道德與價值取向的行為；二、在不同行動領域（特別是那些不以貨幣為媒介的領域），理性選擇理論很難提供對於不同選項加以成本效益比較的共同尺度，因而沒有辦法真正的理解行動者到底如何做決定的；三、基於自然與經驗上證據，真實生活中的社會行為很少是計算性。因此，Collins 主張用他的互動儀式鏈對於鉅觀與微觀的連結機制來取代理性選擇的方案。<sup>21</sup>

上述 Sewell 關於忽視了社會文化與結構對於個人的形塑的批判，以及 Collins 對於缺乏衡量社會秩序共同尺度的批判，更把理性選擇理論的缺陷，指向了更後設的「社會如何可能」的問題上。當理性選擇理論忽視了社會結構對於行動者偏好與動機的形塑，這使得理性選擇無法從理性行動的基礎出發，有效地且內生提供社會秩序的基

<sup>21</sup> Collins 主張，互動儀式鏈的社會機制，強調互動所產生的物理密度、團體的界線、注意力的集中、情緒的共通性等因素，可以用來解釋情緒、象徵、價值定位的行動是如何可能的，因此，可以取代理性選擇理論在日常生活行為上解釋的不足。他更進一步指出，基於社會連帶所具有的各式互動儀式鏈與參與成本，我們可以認為社會乃是一個儀式參與的市場，個人傾向於選擇能最大化其情緒能量的選項，因此，情緒能量作為公分母，其變異程度決定了何種選項會被選擇。而且，相較於理性選擇理論的微觀—鉅觀連結，互動儀式鏈的分析單位乃是互動，並強調互動儀式可以有效地形塑個人的參與動機，並且透過情緒能量與互動儀式的象徵形式，來理解行動者對於微觀情境的認知與決策，同時，更透過微觀情境的積聚，以及考量時間、空間、數目等三項鉅觀因素，來連結鉅觀與微觀（Collins, 1981; 1983; 1988）。

礎。Jeffrey C. Alexander (1992) 就曾指出，即便如 Coleman 如此完整且深刻的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依然只是功利主義的最新翻版，仍然避不開 Parsons (1949) 關於功利主義無法處理社會秩序問題，也無力解釋行動的目標與起源問題，更無法處理規範等批判。同樣地，Josh Whitford (2002) 也指出，許多對於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往往來自於對於理性選擇理論的誤解，真正的社會學批評主要是來自 Parsons 論者對於功利主義外生性價值形成的批評，理性選擇論者通常錯誤地假定行動者的目的是在社會中隨機分佈、在行動前預先給定的，這導致他們無法解釋社會行動如何內生地產生社會秩序的問題，而且，理性選擇理論所採取的實證論的立場，也沒有真正從主觀行動者的視角出發來理解社會行動。<sup>22</sup>

總而言之，即便理性選擇理論已經社會學化，上述的批評，依然指出了如下的缺失：一、理性選擇理論的預測能力往往經不起經驗證據的檢驗。二、對於情緒、規範、文化的忽視，導致無法有效地真正處理日常生活的社會行動。三、其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宣稱，亦必須偷渡整體主義的元素進其理論之中。四、由於理性選擇理論未對上述整

<sup>22</sup> 然而，Whitford 亦指出，類似 Alexander 新功能主義的批評，並沒有辦法真正地動搖理性選擇理論的根基。理性選擇論者通常承認這樣的批評，但是，他們仍然自我標榜其理論所具有的相對優勢。因為理性選擇論者認為，即便 Parsons 論者強調規範對於社會秩序重要性，但是規範與價值既不可觀察、也無法測量，而且其形塑行為的機制也不清楚，因而，不可能將理論立基於這樣的基礎上。至於其他 Parsons 論者的批評，只要多注意結構對於選擇限制，即可彌補。所以，在當前狀況下，理性選擇理論仍是最優先該被選擇的理論。有鑑於此，Whitford 援引實用主義的立場，批判理性選擇理論的真正謬誤：將行動者視為是擁有穩定信念或偏好投資組合的行動者（援引了前述 Hindess 的觀點）。他認為，倘若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將行動視為脈絡關連，而且是一種過程性的立場，那麼，這樣一種偏好投資組合的行動者假設，預設了先驗的目的手段的二元區分，乃是經不起檢驗的。

體主義元素加以理論化，導致無法有效地連結微觀到鉅觀，也無法處理結構與行動的問題，更無法處理「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

## 五、理性選擇理論的內部修正：典範的崩解

上述外部批判，所指出的理論上的缺陷，事實上也在理性選擇理論的內部引起了許多討論與修正。然而，我必須指出，這些討論與修正，很多只是流於理論口號上的宣稱，或是只是修正方向的建言，並沒有辦法有力地重建理性選擇理論來做出回應。即便，理性選擇理論真的做出了有效的理論上的回應，此時，其理論框架是否還能稱之為理性選擇理論是令人感到質疑的。基於理性選擇理論內部的複雜度，底下的對於理性選擇內部的批判與修正，我們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重新定位與自我區隔；二、內部批判與建議；三、理論的重建。

### （一）重新定位與內部區隔：好的與壞的理性選擇理論

面對著外部的批判，不少理性選擇論者也試圖重新定位基本的理論立場，以及在內部進行自行區隔。這樣的重新定位與區隔，乃是試圖切開社會學式與經濟學式理性選擇理論，並提出好的與壞的理性選擇理論的判準。Michael W. Macy and Andreas Flache (1995) 指出，當以微觀經濟學為基礎的理性選擇理論應用於非市場交換時，會喪失其本來所具有簡潔的與明確的理論解釋力。因此，社會學化的理性選擇理論，必須揚棄了微觀經濟學關於自利個人的行動假設與行動者保

有完美且完整資訊的假設，轉向社會交換論所強調之網絡對於選擇的限制，重建一種以行動的非預期結果為基礎的演化式集體行動理論（強調結果的遞迴效果與學習效果）。換言之，他們的論點主要是區隔社會學與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差異來重新定位基本理論立場。

除了重申的區隔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外，亦有不少人援引 Coleman 對於社會學理性選擇的定位，為理性選擇理論辯護，並提出一些修正方向。Debra Friedman and Michael Hechter (1988) 指出，許多理性選擇理論，過度地化約了複雜的社會狀況，採取太過於狹隘也缺乏經驗基礎的行為假設。他們認為理性選擇真正定位，並非在解釋與預設個體行為，而是從行動者偏好的階序結構出發，透過資訊與機會成本的討論，並重視制度限制與行動的集聚機制，以連結微觀到鉅觀的討論，促進鉅觀社會學的進展（類似於 Coleman 的定位）。基於這樣的立場，他們也認為堅守方法論個體主義是必要的。至於，理性選擇理論進一步地改善方向應該朝解釋偏好的形成，並拓深對於資訊與結構限制的理解。

基於相同的定位，Hechter and Satoshi Kanazawa (1997) 則進一步做出好的理性選擇與壞的理性選擇的區辨。針對理性選擇理論相關假設的批評，他們指出，理性選擇理論內部對於理性行動的定義與定位，具有高度異質性，因而，傳統社會學對於理性選擇理論無法處理個人情緒、利他行為、倫理與價值導向的行為的批評，乃是一種誤解，這樣的批評適用於經濟學的決策理論，而不適用於強調社會學的理性選擇理論。事實上，理性選擇理論並不解釋個人在特殊情境下的行為，而是解釋行為的社會後果，強調微觀與鉅觀的連結。此外，針對理性選擇理論對於行動動機預設不當的問題，他們也分出深描（thick description）或淺描（thin description）的模型。社會學理性選

擇理論承認韋伯對於社會行動類型的區分，也承認許多不同的行動意圖與行動模式的存在。而且，出於方法與經驗上的考量，理性選擇理論其實不是那麼重視個人的動機假設，反而更注重社會結構的限制，因而可以與社會學傳統的結構解釋或網絡研究相容，並強調社會學重視的經驗檢驗，而非只是停留在形式的理論建構。因此，他們重申，理性選擇理論對於社會研究的貢獻，在於指出社會活動的複雜度與多面性，同時，也刻畫出個人的活動與偏好如何影響結構的運作、結構又如何影響個人的行動與偏好的形塑，以及其中相互交錯的因果機制。基於這樣的定位，他們指出，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可能的研究方向有：一，重視動機與價值偏好的基本內含；二、拓深對於決策過程機制的理解；三、解釋制度的產生。

同樣基於連結微觀與鉅觀的定位，以及更明確地對於理性選擇的好壞做出區分，John H. Goldthorpe (1996; 1997; 1998) 認為，要將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轉譯進社會學研究中，必須結合社會學的大規模量化資料與經濟學的理論建構模式，如此可以兼顧鉅觀社會結構與微觀個人目的性行動，結合理論建構與經驗驗證。他進一步指出，理性選擇理論在方法論上個體主義、以行動理論為中心、基於行動預期與非預期後果連結鉅觀與微觀等方面，具有理論上的優勢，但是，理性選擇理論內部是具有高度異質性的理論群組，因此，他基於強／弱理性、情境理性／程序理性、一般行動理論／特殊行動理論等三項標準，來定位理性選擇理論內部的變異性。他認為，社會學所能接受的理性選擇理論必須符合兩項判准：一、能夠從行動出發，連結微觀與鉅觀；二、能夠接受經驗檢驗，並且拓深問題的討論，而非只是一種修辭性地捍衛既有理論。因此，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應該接受較弱的理性假定（如 Boudon 的主觀理性的說法），強調結構情境限制而非

程序理性，以及將理性選擇理論視為一種特殊行動理論的觀點。

類似於 Goldthorpe 對於不同版本的區隔，以及結合經驗研究與理性選擇理論的提議，Karl-Dieter Opp (1999; 2013a) 則強調，必須區分狹義（自利假設與完全理性）與廣義版本（非自利假設、強調認知面向）的理性選擇理論。他認為狹義的理性選擇理論無法處理大多數社會科學家感興趣的問題，因此，他主張必須在廣義版本的基礎上，透過經驗調查（如訪談）來驗證行動者的偏好與限制／機會（包括主觀認知與客觀存在的）。此外，他更強調，理性選擇理論的特色在於利用偏好、限制與最大化效用來解釋行動者行為（這三者都可以解釋行為），因此，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應該一方面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來建立與討論行動者的偏好與限制，另一方面，則是在成本效益的基礎上，利用最大化效用假設來澄清偏好與限制對於行動者的作用。如此一來，將可以奠定理性選擇理論行為假設的經驗基礎，並將被視為非理性的行為（如規範）納入理性選擇的解釋模型中（如規範對於個人效用的助益）。

簡言之，這些重新的定位與自我區隔，大多數基於前面我們所提過社會學對於經濟學理性選擇的批評，他們的重新定位不過是重申 Elster、Boudon、Coleman 將理性選擇理論予以社會學化所做的努力，因而，沒有辦法有效地回應上述對於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批評。<sup>23</sup>

<sup>23</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 Goldthorpe 與 Opp 等人的提議與努力下，近來在歐洲，理性選擇理論越來越傾向於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檢驗或重建理性選擇理論。相關的發展趨勢，除了試圖在廣義的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上，引進輔助性的假設來結合經驗研究外，也試圖引入一些輔助的概念（如 frame 概念）與分析機制（微觀—鉅觀的連結）來重新定位理性選擇理論。關於此點，請參看 Clemens Kroneberg and Frank Kalter (2012)。但是，這些努力是

## (二) 內部批判與修正建議

除了重新定位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外，有不少理性選擇論者，也開始正視來自外部的批判，並尋求理論上的出路。針對理性選擇的預測能力、脫離經驗現實等批評，不少理性選擇論者同意這樣的批判，因而試圖呼籲更具經驗取向的理性選擇理論，而非只是經濟學的形式化理論模型。Hechter (1992a) 就曾指出，以賽局理論為出發的理性選擇理論，試圖從囚犯兩難的模型，內生性地回答集體行動是如何可能的，然而，卻始終無法達成共識。這是因為賽局的理性選擇模型，最多只是一種可能狀況的模擬，並沒有辦法有效且充分的捕捉真實世界的集體行動的狀況。同樣地，以賽局理論來補充馬克思理論的 Elster (1993) 後來也承認，賽局的理性選擇理論，並非是一個對現實的如實描述，也不提供驗證經驗命題的理論，賽局的理性選擇理論，應該被當成一種事後詮釋的理論，重點在於能對於複雜現象，提出較為簡潔的理解與啟發。

至於規範、情緒、偏好形成與社會秩序問題等問題，許多理性選擇論者也越來越直接地承認在這些問題上面的處理是有缺失的。首先，在規範與情緒問題方面，Elster (1989; 1996; 1998) 就曾指出，基於規範與情緒等因素在社會現象中的重要性，理性選擇理論必須將規範與情緒作為獨立變數，以結合自利個人假設，拓深鉅觀現象的個體基礎。經濟學家 Robert H. Frank (1993) 也承認，社會學對於理性選擇理論低度社會化個人的批評是成立的。但是，他認為，解決之道是一方面維持堅持方法論個體主義，另一方面，應該引進情緒的

---

否真能避免前述理性選擇理論社會化所遇到的問題與質疑，仍是令人感到懷疑的。

概念，使得理性選擇能處理團體連帶的問題。至於在社會秩序問題方面，Hechter（1984; 1992b; 1994）更指出，理性選擇理論對於社會秩序的看法，往往承繼著霍布斯以制裁機制保證社會秩序的看法，因此，他們通常不接受 Parsons 對於社會秩序起源於行動者內化的社會規範看法，而且，還樂觀地相信只要制裁機制單獨存在即可保障社會秩序，無須引入極有問題的規範概念與內化觀念。然而，這樣地用制裁機構保證社會秩序的看法，極端地低估了制裁所需要的高度監控成本。一旦監控成本被考量，社會秩序很顯然地無法由制裁機制來保障，因而社會學對於角色期待、規範內化的說法是值得重新估量的。因此，他主張理性選擇理論必須進一步將價值含納進來，而非將價值摒除在理論視野之外。此外，針對理性選擇在主觀意義上的缺失，Siegbart Lindenberg and Bruno S. Frey（1993）也指出，理性選擇理論的利器在於其強調相對價格的存在，使得需求法則可以應用到社會學的領域，但是，理性選擇往往假定其他選擇的存在是給定的，缺乏對於相對價格變動的經驗性理解，因此，他們強調必須注意其他選擇的是如何在社會中產生的，並提出一種連結相對價格效應與情境定義的認知框架（frame）理論。<sup>24</sup>

針對理性選擇的成本效益分析應用到社會層面，缺乏衡量尺度的問題，Eric Rambo（1995）亦指出，Coleman 雖假定社會效率、社會最適化的存在（類比經濟學完全均衡下的 Pareto 最適化），但是，卻未能提供有效的標準（此一問題在福利經濟學裡已爭議許久，但仍尚未達成共識）。因此，他認為重回 Parsons 與新功能論對於文化概念的強調，將社會福利標準視為一種文化性的象徵連帶模式是值得發展

<sup>24</sup> 同樣地試圖引入認知框架理論，並試圖結合符號互動論、認知心理學與現象學社會學的提議，亦可以參見 Hartmut Esser（2009）。

的嘗試。此外，針對 Coleman 微觀與鉅觀的連結問題（無法處理結構產生與忽視文化的問題），Rambo (1999) 亦進一步援引詮釋社會學，將 Coleman 的對於資源控制與權利設定的概念，轉化為對於象徵資源與象徵利益的意義控制與界定，並且引入理所當然態度作為意義的產生結構的基礎，進而重建 Coleman 對於微觀行動與鉅觀社會效果的連結。

簡言之，上述的內在修正，基本上都肯定了外部批評對於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的質疑，然而，針對這些的批判，理性選擇論者並沒有辦法提出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來回應內部與外部的質疑，有的只是理論上的退讓（如 Elster 事後詮釋的說法），或是僅僅是改進芻議的建議。即便有一些初步的修補嘗試，但是，這些建議與修正，往往仍是將非理性因素視為外生的假設而加以涵攝，非但未能解釋這些外生變數的起源，更沒有辦法妥善地在理論框架上安置這些非理性選擇的要素，使其能與既有理論框架相容。

### （三）理論上的重建抑或瓦解：重返社會學行動理論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面對著理性選擇理論的困境，無論上述修正建議、內部的自我區隔、還是理論上的重新定位，這些修正都很難有效地回應理性選擇的外部質疑。然而，倘若真正地重視這些質疑，並且進行理論上的重建，那麼，這樣的理性選擇理論似乎將不那麼理性選擇，反而是重返一般性的社會學行動理論。這樣的理論轉變，正好表現在 Boudon 的理論發展上。

Boudon (1998) 曾深刻地檢討理性選擇理論的缺陷。他指出，以工具理性作為基礎的理性選擇理論，無法涵蓋所有行動類型（如韋

伯的價值理性行動與 Alfred Schutz 的“Because of”行動）。理性選擇理論雖然試圖將這些非工具理性類型轉譯成工具理性（表面上是非工具理性，但是在深度層次上會展現自利基礎），或者利用“as if”的知識論立場，將工具理性的自利個人的假設懸而不論，只著眼於理論的預測性有效與否。但是，這樣的策略依然很難面對與解釋行動者對於自身行動的歸因與詮釋。如果可以將表面看來是信念或非自利的行為解釋為具有自利動機，那麼理性選擇理論反而必須去解釋為何行動者會有這樣錯誤的意識與信念。畢竟，這些錯誤意識與信念作為社會事實是需要被解釋的。此外，他也指出，理性選擇理論也面臨經驗證據上的反駁，其理論無法滿意地解釋許多簡單而重要的社會現象，例如人們基於對投票所賦予的期待與意義而去投票、人們對於政治貪污的反感，以及實驗情境下少有最大化自利行為的出現。而且，他還指出，面對這些經驗反駁，理性選擇理論者，通常會引入輔助性的假設，如社會認可的存在、認知上的偏誤、認知框架的存在等，來解決這樣的問題。然而，一旦引入這些假設，理性選擇理論反而失去其魅力的所在——簡潔而清晰的理論，而且，理性選擇理論也很難解釋這些社會認可、認知偏誤是從何而來的。基於上述的批判，他認為，理性選擇理論的關鍵性困境，正是在於將作為特殊行動類型的工具理性行動予以普遍化，並宣稱其理論所具有的普遍性。

基於這樣的立場，Boudon (2003) 更進一步指出，理性選擇的成本效益分析通常有六個基本的理論假設：一、社會現象乃是個人行動的後果；二、行動是可理解的；三、行動是基於行動者的理性；四、行動者對於其行動結果具有工具性的考量；五、行動者是自我中心的，考量乃是自己行動的後果；六、行動者會做成本效益分析，尋求最適化與最大化的結果。Boudon 認為後面三個假設正是理性選擇

理論的問題所在。因此，他認為必須從前面三個假設出發，重建理性選擇理論。Boudon（1998）還指出，前面三個假設，事實上是與韋伯的行動理論，以及 Schutz 對於韋伯行動理論的重建是相容的，而且，他們的理論可以擴大理性選擇理論狹隘的理性概念，將認知理性與價值理性，含納於理論框架中。此外，Boudon（1996; 1997）更指出，這樣一種主觀理性的模型，不但可以取代社會學傳統的規範模型，並且可以解釋原來理性選擇理論很難解釋的文化與倫理道德的因素。

然而，我們不免好奇這樣的理性選擇理論還能稱得上是理性選擇理論嗎？當理性選擇理論放棄了成本效益分析，放棄了工具理性的假定、放棄了自我中心的行動者，改採強調行動者自我合理化與行動者主觀認知與價值理性的行動理論，與其說是理性選擇理論的重建，倒不如說是重回社會行動理論的懷抱。事實上，Boudon 自己也承認，他的主觀認知的行動理論，事實上已經放棄了放棄理性選擇的大部分色彩，只保留了對於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堅持。

## 六、結論

綜合上面的討論，我們大概可以做出以下幾點結論：首先，透過對於社會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我們指出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無法擺脫霍布斯利維坦幽靈的糾纏，其理性自利個人的假設，不但犯了低度社會個人的毛病，而且由於對價值、規範、組織、結構與制度的忽視，因而無法妥善而有效的對於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更無法處理社會秩序逆生的問題。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無法簡單運用

社會學相關議題上。換言之，新古典經濟學的帝國主義擴張與宣稱乃是無效的（這一點是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者所共同接受的，卻往往為許多批判者所忽視）。

其次，透過對於理性選擇理論社會學化的回顧，我也指出，社會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很重視將理性選擇模型運用到社會學傳統領域所遇到的難題。理性選擇理論的社會學提倡者幾乎都共同指出，之所以需要將社會學予以理性選擇化的理由，在於理性選擇理論，不僅提供了一套簡潔有力的理論建構方式，而且，其所堅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立場，更能夠提供鉅觀社會學的微觀基礎，以修正既有社會學解釋上的模糊不清之處，完備既有社會學解釋的缺憾（特別是微觀與鉅觀的連結上）。而且，他們也逐步地放寬對於工具理性的偏執，也更正面地承認結構限制的存在與所謂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換言之，社會學化的理性選擇理論，其根本理論立基與主張，乃是試圖同時結合經濟學清晰與簡明的模型建構方式，以及社會學對於社會複雜性與結構限制的重視等優點。

再者，通過對於理性選擇理論外部批判的回顧，我們指出，即便相關提倡者已經盡最大的努力將理性選擇理論予以社會學化，但是，這樣的修正，事實上仍經不起外部批判的檢驗。無論是在經驗命題的驗證上、情緒與價值規範的問題上、理性的概念上、微觀與鉅觀連結與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上，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仍具有理論邏輯上不可彌補的缺陷。換言之，無論是理性選擇的社會學化，抑或者社會學的理性選擇化，似乎都缺乏理論上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最後，透過對於理性選擇的內部修正的回顧，我們指出，針對外部批判，理性選擇論者也企圖予以回應。他們一方面重申理性選擇內部的異質性，試圖重新定位與內部區隔好的與壞的理性選擇理論，以

捍衛理性選擇社會學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然而，這些往往只是一種立場宣示的同語反覆，而且，對於宣稱理性選擇理論乃是一般的「社會理論」的基石的說法，也逐步動搖。另一方面，理性選擇論者所做出的修正與重建，不是為理性選擇引來更多無法解決的概念與理論框架整合的問題，就是事實上已將放棄了理性選擇理論諸多核心要素，只堅持從方法論個體主義出發的一般行動理論。換言之，因應外部批判而來的內部修正，與其說解決了理性選擇理論的問題，倒不如說反而暴露了理性選擇理論更多的內在缺陷，進而宣告了理性選擇理論的社會學化與一統社會科學的企圖，終究是一場未竟的志業。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把上述回顧，視為是理性選擇理論從氣焰高漲到逐步敗退的一個過程。或許，於此時論斷理性選擇運動的成敗，仍屬太早，理性選擇理論仍然有可能等到下一個 Becker、Elster、Coleman、Boudon 的出現而再度興起。又或許理性選擇理論不僅喪失了其簡潔明晰的魅力，也喪失了其整合既有理論的創造性與動力，終將埋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然而，無論如何，理性選擇理論對於精鍊社會學解釋機制的執念，對於完備與推展社會學解釋的志業，仍然是值得社會學學者進一步反思的。<sup>25</sup>

<sup>25</sup> 近來，類似理性選擇理論在精鍊社會學解釋上的企圖，分析社會學（analytical sociology）的興起，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理論發展趨勢（Hedström, 2005; Hedström and Bearman eds., 2009; Manzo, 2010; Wan, 2012）。關於理性選擇理論與分析社會學的關係，請參考 Opp (2013b; 2013c)、Gianluca Manzo (2013)、Petri Ylikoski (2013) 等人的辯論。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North, Douglass C.

林繼文  
1994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劉瑞華譯。台北：時報。

徐振國  
2005 〈虛假霸權：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理性選擇〉，《政治科學論叢》，25期，頁 67-104。

陳敦源、吳秀光  
2013 〈政治學改造運動的爭議和啟發：從「通則」到「脈絡」的轉向〉，《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5期，頁 1-61。

Agodi, Maria Carmela  
1991 “Rational Fools or Foolish Rationalists? Bringing Meaning Back In,” *Sociological Theory* 9(2): 199-205.

Alexander, Jeffrey C.

1992 “Shaky Foundations,” *Theory and Society* 21(2): 203-217.

Archer, Margaret S. and Jonathon Q. Tritter eds.

2000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esisting Colon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Becker, Gary S.

-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3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3): 385-409.

Boudon, Raymond

- 1981 *The Logic of Social 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Analysis*, trans. by David Silverm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illian Silverman.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2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96 “The ‘Cognitivist Model’: A Generalized ‘Rational- Choice Model’,”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8(2): 123-150.

- 1997 “The Moral Sens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2(1): 5-24.

- 1998 “Limit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3): 817-828.

- 2003 “Beyo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1): 1-21.

Bruce, Steve

- 1999 *Choice and Religion: A Critiqu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houn, Craig

- 1998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 Gene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3): 846-871.

Coleman, James S.

- 1984 "Introducing Social Structure into Economic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2): 84-88.
- 1986 "Soci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6): 1309-1335.
- 1988 "Free Riders and Zealots: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Sociological Theory* 6(1): 52-57.
-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andall

-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5): 984-1014.
- 1983 "Micromethods as a Basis for Macro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2(2): 184-202.
- 1988 "The Micro Contribution to Macro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6(2): 242-253.
- 1993 "Emotional Energy as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Rational Actio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5(2): 203-230.

Denzin, Norman K.

- 1990 "Reading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2): 172-189.

Elias, Norbert

- 2000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eds. by Eric Dunning, Johan Goudsblom and Stephen Mennell, trans. by Edmund Jephcott.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Elster, Jon

- 1982 “The Case for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11(4): 453-482.
- 1989 “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4): 99-117.
- 1993 “Some Unresolved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Rational Behavior,” *Acta Sociologica* 36(3): 179-189.
- 1996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Economic Journal* 106(438): 1386-1397.
- 1998 “Emo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1): 47-74.

Esser, Hartmut

- 2009 “Rationality and Commitment: The Model of Frame Selection and the Explanation of Normative Action,” in Mohamed Cherkaoui and Peter Hamilton eds., *Raymond Boudon: A Life in Sociology*. Oxford: The Bardwell Press, pp. 207-230.

Foucault, Michel

-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rank, Robert H.

- 1993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Reconciling over-and Undersocialized Accounts of Behavior,”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5(2): 160-184.

Friedman, Debra and Michael Hechter

- 1988 “The Contribution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Macro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Theory* 6(2): 201-218.

Goldthorpe, John H.

- 1996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arge-Scale Data-Sets and Rational Action Theory: For a Sociological Allianc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2): 109-126.

- 1997 “The Integration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ory Grounds for Optimism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9(4): 405-426.

- 1998 “Rational Action Theory for Soci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9(2): 167-192.

Granovetter, Mark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Hechter, Michael

- 1984 “When Actors Comply: Monitoring Cos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 *Acta Sociologica* 27(3): 161-183.

- 1992a “The Insufficiency of Game Theory for the Resolution of Real-World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4(1): 33-40.

- 1992b “Should Values Be Written out of the Social Scientist’s Lexicon?” *Sociological Theory* 10(2): 214-230.

- 1994 “The Role of Values i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3): 318-333.

Hechter, Michael and Satoshi Kanazawa

1997 “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1): 191-214.

Hedström, Peter

2005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dström, Peter and Peter Bearman eds.

200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ndess, Barry

1988 *Choice, Rationality, and Social Theory*. Boston: Unwin Hyman.

Hodgson, Geoffrey Martin

1999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Hollis, Martin and Edward J. Nell

1975 *Rational Economic Man: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ser, Edgar

1996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What Rational Choice Theory Can Contribute,” *Politics and Society* 24(3): 249-271.

Kiser, Edgar and Michael Hechter

1991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1): 1-30.

1998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3): 785-816.

Kroneberg, Clemens and Frank Kalter

2012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 73-92.

Lechner, Frank J.

2007 “Rational Choice and Religious Economies,” in James A. Beckford and N. J. Demerath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pp. 81-97.

Lehmann, David

2010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Bryan S. Turner ed.,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p. 181-200.

Lindenberg, Siegwart and Bruno S. Frey

1993 “Alternatives, Frames, and Relative Prices: A Broader View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cta Sociologica* 36(3): 191-205.

Macy, Michael W. and Andreas Flache

1995 “Beyond Rationality in Models of Choi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1): 73-91.

Manzo, Gianluca

- 2010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Its Cr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1(1): 129-170.

- 2013 “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Still a Rational Choice of Theory? A Response to Opp,”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52(3): 361-382.

Norkus, Zenonas

- 2000 “Max Weber’s Interpretive Sociology and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2(3): 259-282.

North, Douglass C.

- 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lson, Mancur

-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pp, Karl-Dieter

- 1999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Ac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1(2): 171-202.

- 2013a “Norms and Rationality: Is Moral Behavior a Form of Rational Action?” *Theory and Decision* 74(3): 383-409.

- 2013b “What Is Analytical Sociolog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 New Sociological Research Program,”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52(3): 329-360.

- 2013c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Middle-Range Theories and Analytical Sociology: A Reply to

Gianluca Manzo and Petri Ylikoski,"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52(3): 394-408.

Pappalardo, Adriano

1991 "The Rational Paradigm in Political Science: Persistent Anomalies and the Role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9(2): 228-231.

Parsons, Talcott

194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7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Civilization Must Find a New Thought Pattern," *Commentary* 3(2): 109-117.

Porpora, Douglas V.

1987 *The Concept of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Rambo, Eric

1995 "Conceiving Best Outcomes within a Theory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A Culture-Level Critique," *Sociological Theory* 13(2): 145-162.

1999 "Symbolic Interests and Meaningful Purposes Conceiving Rational Choice as Cultural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1(3): 317-342.

Sen, Amartya K.

1977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6(4):

317-344.

Sewell, William H.

- 1987 “Theory of Action, Dialectic, and History: Comment on Cole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 166-172.

Smelser, Neil J.

- 1992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a Theoretical Assessmen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4(4): 381-410.

Somers, Margaret R.

- 1998 “‘We’re No Angels’: Realism, Rational Choice, and Relationality in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3): 722-784

Wan, Poe Yu-Ze

- 2012 “Analytical Sociology: A Bungean Appreciati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21(10): 1545-1566.

Whitford, Josh

- 2002 “Pragmatism and the Untenable Dualism of Means and Ends: Wh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Does Not Deserve Paradigmatic Privilege,” *Theory and Society* 31(3): 325-363.

Williamson, Oliver E.

-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Woods, Philip A.

- 2001 “Values-Intuitive Rational Acti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s Insights as a Form of

Social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2(4): 687-706.

Wrong, Dennis H.

1961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2): 183-193.

Ylikoski, Petri

2013 "The (Hopefully) Last Stand of the Covering-Law Theory: A Reply to Opp,"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52(3): 383-393.

Young, Lawrence A.

1997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Religion: Summar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Routledge.

Zafirovski, Milan

1999 "What Is Really Rational Choice? Beyond the Utilitarian Concept of Rationality," *Current Sociology* 47(1): 47-113.

2000a "The Rational Choice Generalization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Reconsidered: Any Theoretical Legitimation for Economic Imperia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18(3): 448-471.

2000b "Extending the Rational Choice Model from the Economy to Society," *Economy and Society* 29(2): 181-206.

2003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to Human Studies: A Reexamination," *Human Studies* 26(1): 41-66.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 central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rational choice programs are heterogeneous, so the 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ies, which have revised the core assump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an't be regarded as "economics imperialism." In order to treat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ies impartially,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m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ies, and also argues that there are critical problems of the rational choice programs in many ways: the verification of their propositions,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the inclusion of emotions and norms, the mechanisms of micro-macro link,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order.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proposals of ration choice theories to sociologize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ies and to unify social sciences may be defeated.

*Keywor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economics imperia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micro-macro link